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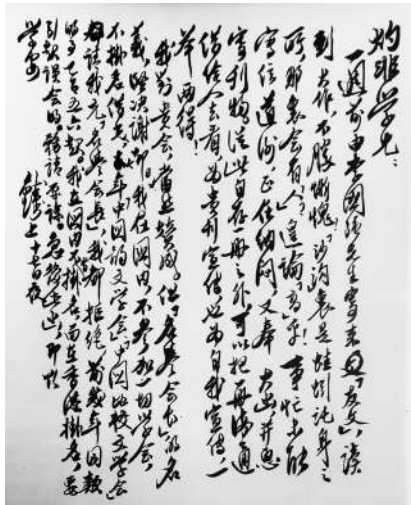
钱锺书先生的一封信

庞惊涛



► 文灼非(右)与钱锺书先生合影

▼ 钱锺书致文灼非书信一封



的是力邀钱锺书担任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名誉会长一职。钱锺书回信，在谈了了对这篇文章的读后感之后，婉拒了文灼非的请求——

灼非学兄：

一周前由李国强先生寄来《友文》，读到之作，不胜惭愧！“沙沟”里是蚯蚓托身之所，哪里会有“人”，这

论“高”乎？事忙未能写信道谢，正在纳闷，又奉大函，并惠寄刊物。从此自存一册之外，可以把一册流通寄给人去看，为贵刊宣传，也为自我宣传，一举两得！

我对贵会，当然赞成。但“名誉会长”的名义，坚决谢却。我在国内，不参加一切学会，不挂名借光，今年，“中国韵文学会”“中国比较文学会”请我充“名誉会长”，我都拒绝。前几年，同类的事已有五六起。我在国内不肯挂名，而在香港挂名，要引起误会。务请原谅。匆复此函，即颂学安。钱锺书上，十七日夜。

钱锺书在回信中婉拒所请，理由在情在理，文灼非只好作罢。此后，从香港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的20余年里，他投身新闻业，创办了《灼见名家》传媒，并出任社长。

文灼非舍文学而就新闻，虽然还在一个大的系统之内，但这样的人生选择一旦形成，人生的际遇和成就便当然会有巨大不同。2023年中，文灼非来到成都，讲起这段拜访钱锺书以及随后的交往时，仍然心驰神往，音声难忘。

终生只居停了一个晚上

钱锺书虽然婉拒了担任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名誉会长的邀请，但他和香港文化界，尤其是文学界还是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抗战期间，钱锺书先生曾在香港居停过一个晚上——1938年9月11日，钱锺书携妻子杨绛和女儿钱瑛由法国马赛启程回国，于10月12日抵达香港，次日上午九点乘太古洋行的客轮“四川”号前往安南（今越南），并于10月15日上午抵达海防；10月16日晨，乘滇越铁路火车从海防启程赴云南，入职西南联大。不知他到香港码头的时间是10月12日的上午还是下午，或者是晚上。

时间短暂、拖家带口，又无本港亲友关照，加之时处全民抗战的非常时期，他大约是没有心情去香港街头走一走看一看的，所以在钱锺书的著作里没有发现任何有关这一夜居停香港的诗文。但对香港的惊鸿一瞥，却让他从此对香港及后来来往的香港朋友保持了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

(本文作者为成都时代出版社副总编辑、《天府文化》杂志社主编)

爱较真的傅雷

王剑



WENRENJISHI

翻译家傅雷爱较真儿，在文学界是出了名的。

傅雷挑选翻译对象时，很较真。别人挑选作品是跟着市场走，谁畅销就翻译谁的。傅雷不是这样，他最初翻译罗曼·罗兰的作品时，中国的全面抗战已经开始，而形势对中国很不利。傅雷在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看到了中国人所需要的精神力量，便决定翻译此作，希望中国读者能“在绝望中重新燃起生的希望”。后来，他又选译了法国作家伏尔泰、巴尔扎克的作品，认为这些作品都是中国读者所需要的精神食粮。

傅雷在翻译作品时，很较真。傅雷认为，在动笔翻译之前，务必“熟读原著，不厌求详”“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绝不动笔”。开始翻译后，会对原文的遣词造句反复琢磨，煞费苦心。为了解《贝多芬传》的创作缘由，他专门与罗曼·罗兰通了书信；为了弄懂巴尔扎克《贝姨》《邦斯舅舅》等作品中的几处用语，他和法国

友人反复通信，直到搞清楚之后才定稿，还特地加上了注释。

傅雷对每天的工作量，也很较真。傅雷做事专注，严于律己，每天要翻译的字数他都定了量。若有事耽搁了，达不到数量，他哪怕不休息也一定要补上。傅雷有生之年共翻译了30多部著作、约500万字的作品，恐怕与这个习惯有关。

傅雷对自己先前的译作，更较真。1942年，他曾译出法国作家杜哈曼的《文明》。过了几年，他感觉这部作品译得有瑕疵，于是又“花了一个月的工夫，把旧译痛改一顿”。无独有偶，他在翻看十年前的旧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时，觉得很多地方不满意，干脆又把这100多万字的著作重新翻译了一遍，方才认定“风格较初译尤为浑成”。有人夸赞傅雷的翻译“似可成为一宗一派”。谁知，爱较真的傅雷听后，明确表示“愧不敢当”：“鄙人对自己译文从未满意，以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而论，自问与预定目标相距尚远。”

星云大师的“一笔字”

周惠斌



WENRENJISHI

星云大师平生静心修行，数十年潜心临池，生前曾独创“一笔字”书法，饮誉海内外。他在《一笔字的因缘》中讲，他20多年前罹患糖尿病，后来引起并发症，导致视力逐渐下降，日益模糊，看书写字愈加困难。由于视力模糊，写字落笔的时候，眼睛看不清，只能用心揣摩字与字之间的距离，所以不管几个字，都要一笔到底，必须一挥而就，一气呵成，全凭心里的衡量。“眼看不见，但是心还在。”大师因此自言：“一笔字”是他晚年“在经历了眼疾的痛苦后悟来的”。

许久以来，人们评价星云大师及其书法，谓之“当代出家人里最有个

性的一个”。他曾坦言自己不会写字，对自己的字没有信心。他在岳麓书院演讲时曾说：“不要看我的字，要看我的心。”他还对人讲：“我的字不好看，人老了也不好看，那么给人看什么呢？请看我的心，心看不到，但我的字是用心写的。”

星云大师的“一笔字”书法，其文字内容多为劝人向善、慈悲包容的警句箴言，既有佛教经典之语“无上士”“世间解”等，亦有与人们生活相关的哲思睿语，如“日日好日，处处好处，人人好人，事事好事”“一心不二”“活在当下”“淡泊人生”“仁者无敌”“我心自在”等，将佛语禅句与世间寻常言辞和深情祝福，传达出他对人生百态的感悟，给人以视觉和心灵的双重滋养。

高晓声“偷”学做竹篮

刘建东



WENRENJISHI

20世纪60年代初，高晓声被安排到三河口中学教了3年书，又被安排到位于三河口乡西南的一个西姚大队学习劳动。

高晓声天性聪明好学，许多农活和手工艺一学、一看就会。三河口乡东南有一个东姚大队，那边的村民有一项做竹篮的手艺，大队为此组建了合作社，将农民制作的竹篮售卖到远近几十里范围内的乡镇农村，是一项很不错的副业。虽说同姓一个“姚”，但东姚大队这边技术保密措施好，不肯教西姚大队的人，为此西姚人干瞪眼，眼红也没办法。

安排和照顾高晓声生活起居的是西姚一个小队长，叫姚培大，他谈到了东姚人做篮时很是羡慕。高晓声问：“那你们怎么不学呢？做篮又不是他们的独行。”姚培大说：“他们不肯教，我们也一直偷学，就是做不好。”高晓声说：“这有什么难的，你明天帮我弄一只篮来，我就不信做不好。”

果然第二天中午，姚培大就去集市上买了一只竹篮，交给了高晓声。高晓声将竹篮从外到里进行了仔细观察，然后又把竹篮一边拆解、一边依原样编织，研究了两个晚上，基本掌

握了做篮的工序。三河口中学有一个学生是东姚村上人，高晓声便去东姚找到这个学生，说是家访，眼睛却一直看着学生家家长编织竹篮，也顺便问问做竹篮的细节。学生家长便毫无保留地向高晓声介绍了做竹篮的一道道工序流程。

随后，高晓声找到了姚培大，请他购买一些毛竹和篾刀等工具，晚饭后在姚培大家里做了第一只竹篮，并且取得了成功。姚培大很高兴，当即决定要发动社员开展做篮这个副业。高晓声建议说：“东姚那边只做十斤头的中篮和小篮，咱们也做中小篮，东姚人是要来吵架的；我听说南面横山桥那边做三十斤头的大篮，咱们也做大篮，然后卖到江阴那边去。”

天下无不透风的墙，东姚人知道西姚人买竹子做篮，就派了一些人上门来指责西姚人偷技术，还说要跑去乡里告状。姚培大暗暗佩服高晓声的先见之明，对东姚人说：“你们睁大眼睛看看，我们都是做的大篮，谁稀罕做你们的小篮，铜钱赚不着，还白花力气。”东姚人到处看看果然都是大篮的半成品，无言以对地走了。

多年以后，高晓声谈起这段做篮的回忆，颇为感慨，并写进了自己的小说中。

吴青霞拒绝造假

刘兴尧



WENRENJISHI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吴青霞随父迁居上海，那时她还不到20岁，为了帮父亲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她开始以自己的一支画笔走向社会，踏上了以卖画为生的道路。

那时的上海，汇聚着江浙一带的大批丹青好手，他们有的成名已久，有的画技精湛，要想在这些人中出人头地，何等艰难。所以，一些尚未成名或为生计所迫的画家，开始冒用古代名家的名号来仿作旧画以获取丰厚的钱财。

吴青霞的父亲是一位鉴赏家，他非常反对这种营生，认为这是关系到画家个人品德和荣誉的问题。他郑重地告诫吴青霞，饿死也不能去仿造古画，要从生活中寻找自己喜爱的绘画题材，要在勤学苦练中去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要用真才

实学赢得社会的认可。吴青霞牢记父亲的教诲，坚持用自己的真名落款。对于她摆在画廊里的画，很多人提出了疑问：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能画得这样好吗？她的画应该是父亲代笔的。对此，吴青霞无可奈何，但她仍然只署自己真名，饿死也不造假。

由于很多人有疑虑，而且坊间传言越来越盛，导致她的画销路不太好，画廊老板急了，就和吴青霞商量，希望她也能仿作古画，或者能做件事平息众议。吴青霞首先拒绝了造假的要求，她决定在众目睽睽的场合下当众挥毫，让大家看看她的水平，而且做了多次。众人一看，这个年轻姑娘笔墨纯熟、气势流畅而不失法度，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经此公开亮相，上海众多藏家的疑虑打消了，纷纷来订吴青霞的画，她的很多画作，都接到了复订的订单，一时声名鹊起，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繁花》火出圈!“仗剪”走天涯

——文史资料里的“红帮裁缝”故事

郑连乔 景士杰 本报记者 鲍蔓华



ZHENGXIJIJIYI

随着电视剧《繁花》的热播，“红帮裁缝”再次被大家广泛提及，笔者在浙江省宁波市政协出版的《宁波帮系列丛书》——《宁波帮与中国近现代服装业》一书中，找到了关于“红帮裁缝”的详细记载。

创造了五个第一

奉帮裁缝又称红帮裁缝，是浙江省宁波市的地方传统手工艺。已经在2010年8月7日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奉帮裁缝（红帮裁缝）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技艺精湛的著名人物有：王才运、金德钦、金兴君、金达迎等。

“红帮裁缝”起源于清末民初。宁波是当时最早对外贸易的港口城市之一，许多裁缝师为外国人（也称为“红发”）裁剪衣服，由此得名“红帮”。“红头发”最初是荷兰人的名字，后来通常指欧洲人。在老上海，“红帮”指的是西式服务业或制造业。在中国服装史上，“红帮裁缝”创造了很多第一：中国第一套、中山装第一套、第一套店、第一套理论专著、第一套工艺学派。这些“第一”里，“荣昌祥”的身影不可忽视。

1910年，王才运在上海南京路开设了当时最豪

华的三层十间门面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成为上海滩名气最大的专业服装店。1916年，开始独资运营。孙中山、章太炎、梅兰芳等名人都曾来此制作西装。

“天下三主，顶大买主”

红帮业内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加工足料，精工细作，永不走样”，依靠刀功、手功、烫功、车功的综合运用，红帮裁缝在实现西服实用功能的基础上，达到平、服、顺、直、圆、登、挺、满、薄、松、匀、软、活、轻、窝、蹼的成衣效果，实现西装工艺美向艺术美的转化。

人虽高矮胖瘦、各有千秋，但在红帮裁缝眼里，扬长避短是基本。他们有生动形象的行业术语来描述特殊体形，如对于驼背的人称之为“小牛背”，溜肩的人称之为“美人肩”等等。一个多世纪的摸爬滚打，红帮裁缝们不仅造就了一双能够“以目代量”的“火眼金睛”。20世纪，随着“泰记”“良友”“汤麦世”等红帮西服店陆续在上海南京路兴起，被称为西服业头块牌子的后起之秀“培罗蒙”与“皇家”也相继打出了“不偷工，不减料，洗十次八次，不更动‘小样’”的口号。

宁波有句老话：“天下三主，顶大买主”。在讲究技艺的同时，红帮裁缝十分重视无微不至的服务，无时无刻不为客人“把脉”，成就了最早“用户画像”。

政协委员带头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红帮裁缝”大展拳脚，他们的梦想已不再只是开一间“三层十间门面”的西服店。杉杉、雅戈尔、罗蒙、爱伊美、太平鸟等一大